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傅 山 源

随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被粉碎,苏维埃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资产阶级复辟思潮和“左”倾教条主义曾分别从右的和“左”的方面进行攻击。列宁及时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保障了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本文试图对列宁领导这场斗争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探讨。

一

苏维埃俄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资产阶级复辟思潮曾一度抬头。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把当时苏俄政策上的转变,视为布尔什维克改变了路线,放弃了共产主义,“已经向后转,转向资本主义。”^①他们叫嚷说:“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容许租让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②孟什维克分子苏汉诺夫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依据,他在名为《革命札记》的回忆录中,胡说俄国由于经济和文化落后,“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客观的经济前提”,因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断言社会主义在俄国是没有希望的,并提出了一系列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们在经济上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竭力宣扬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攻击苏维埃国家“消灭民主”、“没有自由”。当时有一伙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组成的“路标转换派”,期望苏俄政府“在经济上让步之后在政治上也会有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让步。”^③他们认为用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可以逐渐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使它“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④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特别在思想文化界主张“独立”、“自治”,不要党的领导叫嚷,一时甚嚣尘上。在莫斯科等大城市的高等学校中,一批资产阶级教授公然煽动罢课罢教,要求大学自治,反对俄共(布)的领导。

列宁及时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思潮的斗争。鉴于苏汉诺夫的言论很有代表性,列宁抱病口授了《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这篇重要论文,批驳了苏汉诺夫等人的攻击,阐明了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还在许多文章、讲话和书信中,批判了“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说教,驳斥了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指出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鉴于一些人对美国的所谓“现代民主”崇拜得五体投地,列宁要求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彻底揭露它的虚伪性。针对当时叫喊甚烈、蛊惑人心的“出版自由”的口号,他强调说:在世界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强大许多倍的情况下,出版自由“就是为敌人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为他们提供武器,“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⑤针对所谓“独立”、“自治”的叫嚷,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党的领

导。列宁还深刻地揭露了路标转换派的阶级本质，指明了同这一派别作斗争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会得胜”的问题。^⑥考虑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会有所加强，列宁要求“必须善于抑制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的方面”，“善于使这些消极的方面缩小到最小限度”。他认为“我国的法律使我们完全可以作到这一点。”^⑦苏俄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一方面准许国内外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它实行检查监督，使新经济政策时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成为“经过严格训练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障新经济政策的顺利贯彻，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强力能够对付那些想要复辟的人。”^⑨他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狠狠打击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列宁要求苏维埃司法机关“无情地（直接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为了教育大家，他建议在莫斯科等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安排和进行若干有声势的、有教育意义的示范性审判。”^⑩

二

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资产阶级复辟思潮的冲击，也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责难。他们竭力阻挠和反对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他们组织各种名目的反对派，挑起一次又一次的争论。“左倾”反对派的领袖托洛茨基，宣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唯一可能的政策，指责新经济政策使苏俄“有被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工人阶级专政有被推翻的危险。”^⑪“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柯伦泰，鼓吹“迅速地向共产主义兼程前进”，要求加紧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她攻击“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在俄国实现复辟”，“俄国需要再进行一次工人革命。”^⑫“民主集中派”的领导人奥新斯基声称：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把“管理国民经济的钥匙”交给了资产阶级。^⑬“无产阶级文化派”责怪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思想复活。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由于存在“求快”、“求纯”的“革命激情”，在“左倾”反对派的煽动下，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也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放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向资本主义倒退。一些外国共产党人也担心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会被新经济政策葬送。

列宁在许多文章和报告中指出，在严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它对于战胜困难，赢得战争，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列宁不止一次地提到“直接过渡”以及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制订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他说：如果不纠正，“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⑭列宁反复论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大家自觉地执行新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⑮他还说：探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⑯列宁认为“左倾”教条主义既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了解这一政策开始时实行退却的性质。他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⑰基于此，它对农民所作的各种让步是完全必要的，决不是什么“富农政策”。列宁承认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但它并不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也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而只是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由猛烈的正面冲击变为缓进的迂回包围，而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针对“左倾”教条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明确区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针对“左倾”教条主义鄙视商业，把它和建设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列宁号召共产党人必须懂得并紧紧抓住商业这个“环节”，否则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⑮“左倾”教条主义把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看成是向资本主义投降。列宁指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有利，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可学习和利用。他预计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必然会使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但这用不着害怕，因为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商业、市场又都处在国家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这就能够对资本主义的活动加以限制。随着农业的恢复，国营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长，一定能够战胜和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列宁满怀信心地预言：“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⑯

三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和俄共(布)在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思潮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有：

1. 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租让制为例，它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租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很大好处，但也“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使农民腐化”这样一些副作用。列宁一方面针对租让问题上的自由化言论，要求加强监督和控制，要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腐蚀“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⑰并告诫人们，租让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是“战争”在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的继续。另一方面，他又批驳了种种否定租让制的责难，毫不动摇地坚持实行租让政策。他说：“我们权衡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后，深信我们所采取的、旨在实行租让的政策是正确的。”^⑱列宁坚决表示：我们“无论如何要实行这种租让。”^⑲

2. 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不论是资产阶级复辟思潮还是“左倾”反对派，都否定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列宁正是在斗争中，坚持加强党对各条战线，特别是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在列宁的主持下，俄共(布)从十大到十二大，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加强党的领导决议。为了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党的十大决定将政治教育局改组成党中央的直属机构，随后，党中央组织局又决定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报刊处，对各地报刊进行总的领导和监督。

党和列宁在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思潮的斗争中，严格区分敌我，注意区别对待，着重思想教育，团结绝大多数。对“国内侨民集团”这类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组织，坚决“使用镇压手段”，而对处在转变过程中的路标转换派，一方面充分肯定它在团结、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和解”、并准备参加“复兴祖国”的侨民和知识分子中所起的积极、进步作用；另一方面主要从思想上揭露和批判该派中存在的和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对反动组织和反动人物采取强制措施时，列宁也不忘告诫全党：“不应过高估计镇压的作用”，^⑳要“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㉑至于对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潮影响，在言行上犯有一般性错误的人，党和列宁始终坚持进行正面思想教育。

党和列宁在同“左”的倾向作斗争时，同样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把“倾向”和“派别”严格地区别开来。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发展成“左”的派别活动，列宁要求经常地注意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纳入无产阶级的轨道。就是在同“左”的派别作斗争时，列宁也强调主要是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不少“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如曾经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万能的布哈林，在列宁的

严厉批评和耐心帮助下，也逐渐认识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后来成了新经济政策的积极维护者和阐释者。

党和列宁在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思潮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注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鉴于路标转换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学有所长的旧知识分子，党和列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同时，非常重视利用这些人的知识和经验，把他们安排在各种重要岗位上，让他们各得其所，发挥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即使少数因错误严重受到尖锐批判的头面人物，也没有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而是分配适当工作，用其所长。当时几乎所有的“左倾”反对派都歧视和排斥知识分子，攻击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列宁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⑤列宁不仅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信任知识分子，而且在生活上也要求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切实贯彻，团结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3.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大力进行思想文化建设。党和列宁为此采取的重大措施有：

① 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潮的鼓吹者，还是“左倾”教条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代替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一些“左倾”分子则把哲学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抛弃哲学”的口号下否定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列宁撰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捍卫战斗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宗教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当时有些自然科学家以“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为满足，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列宁语重心长地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⑥他要求自然科学家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同非党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共同进行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宣传。在党和列宁的领导下，广大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投入了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战斗。

② 出版马列著作，创办各种刊物。1922年3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的决议指出：“必须设立出版战斗性的宣传鼓动书籍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社”。^⑦决议还要求出版大型的通俗科学和文艺杂志。1923年出版了《马克思文集》的头两卷。1921—22年间，开始出版《列宁全集》，同时也注意出版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先驱者的著作。从1921年起的短短几年里，创办了一系列大型思想、政治理论刊物，以及自然科学和文艺杂志。

③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包括各种级别、形式和层次的党内教育体系，培训党员和干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党的十一大的决议指出：“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修养水平。这个任务主要应由党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系统——从政治常识学校到高级党校来实现。”^⑧代表大会建议中央和省委选拔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同志专门从事政治理论教育。苏俄通过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大学、地方党校以及各种形式的学习、研究班，培训了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建立起一支坚强的理论队伍，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抵制错误思潮侵袭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④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青年一代的教育。党和列宁在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过程中，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

（下转20页）

是在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向中部地区转移、加速中部地区经济建设时，更应高度重视长江防洪问题，搞好长江防洪体系的建设，以保障中部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地区洪灾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上游来水峰高量大，超过了河道的下泄能力。目前，荆江河段的安全泄量仅6万秒立米，而近百年来宜昌洪峰流量超过6万秒立米以上的达21次，其中1870年洪峰流量高达11万秒立米。解决中下游防洪问题固然应贯彻“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方针，充分发挥中下游堤防的作用，但由于目前长江堤防已经很高，一般约5—8米，最高的荆江大堤达10—16米。若再靠继续加高堤防来提高防洪标准，不仅工程量浩大，经济效益差，而且很难保证在洪水来临时几万公里的堤防不溃口。因此，今后长江防洪体系的建设，应在继续充分发挥堤防和分蓄洪工程作用的同时，结合防洪、发电、航运、旅游、水产养殖等综合利用，修建大、中型防洪水库，以拦蓄超额洪水。而长江三峡水库紧接川东暴雨区下游，临近长江中游防洪重点荆江河段，控制了荆江洪水来源的95%以上和汉口以上洪水总量的2/3左右，是减轻长江中游洪水威胁，扭转荆江河段防洪被动局面最有效的工程措施。

随着三峡水库大坝的建成，洞庭湖区和江汉湖区的防洪效益将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荆江地区的防洪标准将从百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荆江两岸的防洪条件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

(上接34页) 1920年11月，列宁在为人民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国立莫斯科高等美术工艺学校》的决议作修改时，提出在所有年级必须讲授政治常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原理，并要求严格监督这一措施的贯彻落实。列宁还亲自领导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的教学改革，采取一系列办法改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列宁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⑤ 开展扫盲和文化教育，进行文化建设。列宁从俄国文化落后，居民大部分是文盲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思想建设的同时，必须开展扫盲和文化教育，进行文化建设。他说：“只要在我国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sup>②④</sup>“要进行政治教育就无论如何要提高文化。”<sup>②⑤</sup>党和政府通过扫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迅速提高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青年的科学文化水平。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大大增强了人民群众抵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能力，为俄共(布)取得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为新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注释：

①②④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553、556—557、634页。

③⑥⑦⑧ 《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38、241、204、205页。

⑤⑨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92、303页。

⑥⑭⑮⑯⑰⑱⑲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6、661、571、617、578、382、591、608—609页。

⑦⑰⑱⑲⑳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0、143、401、59、56页。

⑧ 《列宁文稿》第4卷第224页。

⑨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

⑩ 《列宁文稿》第4卷第221、223页，文中黑体字系列宁本人所用。

⑪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376、375页。

⑫ 参看《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66、67页。

⑬ 参看《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1辑第8页。

⑭⑰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421页。